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结果揭晓——

贵州两部作品获奖

本报讯 7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结果揭晓,评选出25部获奖作品和5名获奖译者,贵州有2部作品获奖。其中,侗族作家姚瑶凭借《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获获借文学奖;布依族诗人牧之《盘江魂》获诗歌奖。

姚瑶创作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讲述了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村BA”赛事持续走红背后的故事。书写了一个小村庄历经脱贫攻坚后的新变化,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该书由“台盘风貌”“‘村BA’前传”“火爆‘出圈’”“‘村BA’中那些人”“‘村BA’的未来”五部分组成。作者用在场者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百姓的欢喜、乡村的振兴、国家的兴旺。该书是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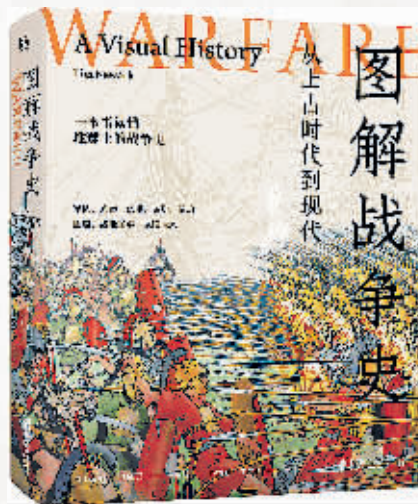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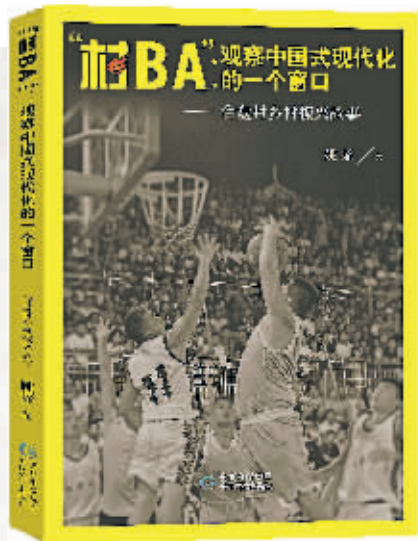
点出版物,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先后荣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等奖项。作者姚瑶是贵州天柱人,现为黔东南州作协主席,著有《疼痛》《芦笙吹响的地方》《烛照苗乡》《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等作品集。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2022《民族文学》年度奖、贵州省第三届“尹珍诗歌奖”创作奖等。

《盘江魂》是布依族诗人牧之的第12部诗集,也是他继抒情长诗《纳祥郎岱》、叙事长诗《姜仕坤》出版后的第三部长诗集。全诗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盘江之源、盘江之魂、盘江两岸美、盘江遗韵、盘江之梦。作为盘江的子孙,作者把他对南北盘江的深情和热爱,用三千多行唯美而富于质感的诗句真挚地表达出来,让这两条流淌了千载万年的南北盘江有了抒写它的第一部抒情长诗。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对于生活在南

盘江、北盘江两岸的人来说,盘江,就是生命之源,就是母亲河,就是血脉相连的生命纽带。”牧之、本名韦光榜,贵州贞丰人,贵州省诗人协会副主席、黔西南州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出版有《心灵的遥望》《依然如故》《纸上人间》《风在拐弯处》《牧之诗歌选》等十余部作品,曾获贵州第二届专业文艺奖等。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举办,设有长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奖、翻译奖,每四年评选一次。该奖项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我国文学创作最具权威的四大国家级文学奖,对推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鼓励民族作家作品发挥了良好效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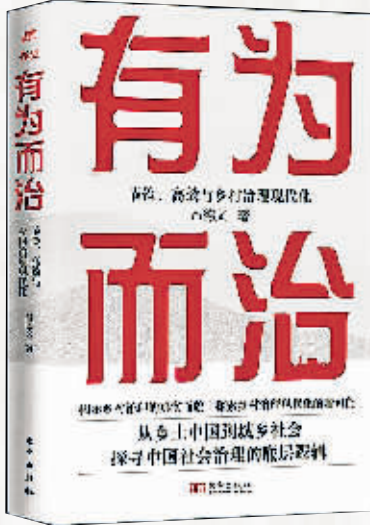


富有的阶层中招募,因为他们必须财力雄厚,才能自行购置装备。

简言之,所有的军队都由轻装和重装兵种混合而成,面对不同战况,要采用不同的战术发挥各自优势,方能制敌取胜。所谓战术,指的是交战之时军力和装备部署之术。历史上的名将要能改变传统战术,大胆布局,推陈出新;要么能因地制宜,灵活调整战术,出奇制胜。为帮助读者理解军事发展史,本书忠实记录了世界各地战术的重大变化。

总之,全书文字结构清晰,术语表述深入浅出,堪称战争学的“百科全书”。此外,书中还有海量插图,作者以最直观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的军队和战士个体肖像。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文/图



乡村治理现代化。从节俭、高效两个关键词出发,本书尝试探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能性:简约主义在现代乡村治理中是否还有制度空间?针对这一问题,本书从实证经验出发,解释了那些成功的乡村治理实践是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原有的制度空间,而一些现代的做法又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文/图

作家心得

如何写好返乡题材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网剧《我的阿勒泰》的爆火,被认为是返乡剧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除了这部剧,还有取景于景德镇的《另一种蓝》,讲述宁夏的《星星的故乡》,让泉州火上加火的《春色寄情人》等剧作,播出后都获得不错的反响。在中心眺望边缘,向边缘寻求意义,当大城市的人纷纷向中小城市乃至乡村迁移以安放内心的同时,以“故乡”为议题的作品,自然更受关注。

我长期写作返乡题材,十年来出版了包括《错认他乡》《世间的陀螺》《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燃烧的麦田》等图书,这些文字以散文或非虚构的体裁出现。

长期进行故乡题材的写作,我自认为有了一点写作经验,但事实表明,那些所谓的写作经验,随时会被新的印象、观察、发现所覆盖。每隔几年,故乡和人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故乡内里的永恒内核固然坚实,但那些不断裂变变的表层,也使得故乡这一概念如同星空下的霓虹灯一样,闪烁着神秘而迷人的色彩。

如何写好返乡作品,首先要明白故乡之于你的意义。对我来说,故乡是一个集合了地址、时间、记忆、情感为一体的混合体,很难从单一层面去定义它,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它更像是生活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到了假期忍不住想要奔赴的方向。它对我同时具备唤醒与校准的作用,唤醒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感受,校准我在外被挤压变形的言行动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故乡之于一个漂泊者来说,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但它的存在依然无比重要,它是根据地、避难所,逃无可逃之后最后的回归处。

写好故乡,要不断思考你与故乡的关系。故乡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地域意识并不强烈,如同蒲公英一般,落到哪儿都可以生根发芽,对故乡并无执念;有的人在出生地经受磨难,终生不愿踏回故土;有的人离乡之后,不断给故乡加上滤镜,曾经不以为然的物事,也变得无比珍贵。所以,一定要明晰你与故乡之间的情感属于哪一种,明白这种情感之后,有助于你使用更清晰的立场、更精准的语言,来建立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联系,获取更多的共鸣。

我认为要用自由的态度来看待故乡。在古诗词里,故乡是厚重的,也是轻松的;是宏大的,也是细腻的;是激烈的,也是清冷

的……如此复杂的故乡,带给人安慰也带给人压力。处理这种复杂情绪的最好态度,是自由观念,这种自由观念很少能在故土滋生,它诞生于距离故乡千里、万里之外的陌生之地,它是你通过瞬息万变的外界所获得的一种能量。当你携带这样的能量在故乡行走,就会发现曾经桎梏你的情感荡然无存,曾经让你觉得沉重的事物纷纷消解,你只会觉得快乐、放松,感觉到被滋养而非被消耗。同样,这样的自由态度,本身也会给故乡带去更多的活力,是一种双向的奔赴。

具体到作品当中,“诚恳”是写好返乡题材的关键词。文艺作品太具有蒙蔽性了,同样的题材,不同的作者会把它写得风格各异、写出迥然不同的味道来。理论上讲,单一作品无论将哪一种风格写到极致,都算得上好作品。但近期的返乡题材,好像过于集中地给故乡加上了美好的滤镜,而失去了一些现实主义表达。在短期内,作为一种受欢迎的创作风格,如此表现问题不大,但从长期而言,如果“诚恳”含量不足,或者干脆缺席,容易带来反噬。所谓“诚恳”,除了词语本身具有的诚恳恳切、不矫揉造作之外,还应包含真实、磊落、坦荡等情感与价值观,以及旁观、审视、批评等理性元素。故乡题材,不能只让抒情成为主旋律,一味地美化与升华,亦会导致滤镜破碎后的失落。

还有就是选择合适的体裁来写故乡,非虚构、散文、小说、诗歌、剧本等体裁,都适合于创作当下的故乡景物与故事。我已经习惯于用非虚构和散文的形式来写作故乡,如果选择虚构性质的小说和剧本来进行写作,就会觉得无从下手。体裁的选择,决定了作者观察和讲述故乡的视角,但相信只要是优质的作品,是能够打破体裁界限的,那些最为接近故乡当下样貌、表达对精神故乡追寻意图的文字,都能够直抵读者或观众的内心。

写作返乡题材,不仅要写返乡者掺杂了向往与犹豫、回归与徘徊的内心,更要写故乡守土之人的接纳与诤议、打量与审视。本质上讲,离乡之人再回故乡,其实已经是客人身份,返乡题材必须要处理好主客关系,并从中解读出人际、文化、情感等方面的共鸣或冲突,当写作者的注意力与文笔都倾向于这一点时,所创作出来的返乡作品,自然就会好看起来。

新书速递

励志体育绘本《中国骄傲》首发

《中国骄傲》新书首发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举办。青少年励志体育故事绘本《中国骄傲》,共10册,分为《中国女排》《中国乒乓》《中国跳水》《中国田径》《中国射击》《中国游泳》《中国体操》《中国羽毛球》《中国时刻》《中国冬奥》,用140多个动人故事、

600余页生动图文,描绘了中国体育健儿征战奥运的历程以及在赛场上争金夺银的精彩瞬间。

启动仪式上,中国奥运首金得主许海峰、中国男子跆拳道首金得主赵帅亮相,吸引百余名观众参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实现中国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今年正是中国在奥运赛场夺得首枚金牌40周年,作为《中国骄傲》系列图书特邀顾问,许海峰与大家分享奥运故事,令现场掌声不断。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运动员赵帅创造历史,夺得中国男子跆拳道项目首枚奥运金牌。作为《中国骄傲》系列图书推荐官,赵帅讲述了自己的奥运故事,并现场向孩子们分享练习跆拳道

的感悟。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骄傲》主编柳建伟表示:“希望通过《中国骄傲》这套书,让孩子们铭记一个个感动中国的动人体育故事,提升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骄傲感,感受与传承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

路艳霞

新作推介

《图解战争史》:

一本书了解战争的演变和发展历程

但凡讲战争和兵法,似乎都离不开《孙子兵法》。新出版的《图解战争史》一书也不例外。该书作者、英国作家兼历史学家蒂姆·纽瓦克从《孙子兵法》的一句话说起:“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翻译成白话文,即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合适的战略战术,这确实是制敌取胜的关键。作者认为,交战之时,蛮力并不是制胜因素,战斗者的机智、审时度势和创新能力才是真正的优势。天才军事家总是不惧劣势,屡出奇招,智胜对手,这种顽强的精神、灵活的策略,构成了《孙子兵法》的核心内容。

《图解战争史》一书,正是以“取胜”为核心线索,来梳理和解读战争史。

该书首先介绍战争的具体过程和相关规则,包括武装冲突中繁琐的细节,旨在揭示战争中各种要素的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为此,作者广泛考察了武器系统、指挥结构、后勤、组织、通讯、士兵的招募和训练、军队类型等战争要素,以及配置这些要素的方式方法。作者按时间顺序,介绍了战争的发展演变“进化史”。

战争起源于人类文明形成之前。通过观察两个不同的大猩猩群体之间的冲突,可以看到人类远古战争的大致原型。但是,猩猩群体之间的斗争,不会导致不同群体之间有组织的冲突。而人类这一物种发

展到部落阶段时,其组织能力远远超过大猩猩。因此,人类部落能够发起成千上万人参与的有组织的冲突。也就是说,在智人的认知能力足以创造族群标记时,部落战争就随之出现了。考古发现表明,在大约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创造力爆发,视觉艺术空前繁荣。显然,那时人类的认知水平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保守估计,部落战争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自那以后人类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各群体之间的冲突成为常态,这种冲突也是引起文化变革的重要因素。

即便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军事的重要性依然首当其冲。正如《左传》中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同的兵种逐次登场:青铜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650年),马拉战车投入使用,士兵能够借助战车作战;铁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1000年),纪律严明的步兵、首批骑兵、首批有效的攻城装备出现,战士开始尝试使用多种武器联合作战。公元前7世纪,希腊将领麾下出现重装步兵,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重装骑兵出现,大型投石机也隆重登场。亚历山大帝

得出结论,美国南北战争堪称第一次现代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普通士兵也用了步枪(即来复枪),步枪枪管内壁刻有膛线,其射程之远、射击精度之高,远胜前代。人类战争史最终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发生质变,进入现代战争阶段。

其次,该书还从“进攻的矛”与“防守的盾”这一视角,解读了军事史的进程。人们研制武器,以攻克最先进最坚实的盔甲,而盔甲也一直在升级换代,以抵御新式武器。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这种靠技术驱动的军备竞赛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介绍了历代能工巧匠研发并改进的诸多武器,它们不仅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有些更是巧夺天工的神来之笔。不过,武器系统并非本书的全部内容。新式武器的出现,催生了兵种的变革。战士必须有盔甲护体,以降低风险,避免伤亡,但防护也得有度,否则就不能有效地使用武器发动进攻;此外,装备成本也是人们必须考虑的因素。比如,弓箭手不宜身披重甲,否则拉弓射箭的能力就会受影响。再者,战场上必须有成千上万的弓箭手协同作战才具有杀伤力,但是若为这些人都配备最高档的全副铠甲,那开销就太大了,根本不现实。弓箭手这一兵种的优势是轻盈灵活,可以从普通人中招募。相比之下,骑兵属于突击兵种,他们需要重装铠甲护体。骑兵是昂贵的兵种,只能从社会上

《有为而治》:

讲述乡村治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长期从事基层治理研究,新作《有为而治》是其近年来研究乡村治理现代化议题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成果。

该书首先从概念史的角度,对“乡村治理”这一学术名词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乡村治理”的概念史并不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具体而言,乡村治理是国家与乡村社会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从国家建设视角来看,乡村治理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又是乡村自治能力的运用,表现为农村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乡村治理,既指向历史经验和当下实践,也指向未来。

从历史经验而论,传统时期符合国家治理逻辑的乡村治理往往是“无为而治”,过于积极的行政反而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学术界通常用“土绅模式”或“地方精英模式”来描述帝制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其基本特点是“皇权不下县”。简约治理机制的社会基础

在于熟人社会,政府政令通过中央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到达县一级;在县以下,则通过乡约、差人等特殊机构到达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士绅可以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将压力透到上层,这便是官民两便的“双轨政治”。很长时间以来,乡村治理一直维持着无为而高度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这充分表明了简约主义治理传统的韧性与生命力,它也构成了中国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

然而,伴随着传统熟人社会的瓦解以及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传统意义上的简约治理几乎已经不存在,乡村治理的形势由此变得愈发复杂。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这架庞大的治理机器变得日益精密,不少属于乡村治理的事务,纷纷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治理目标;二是乡村社会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下,乡村的人、财、物快速外流,原有的乡土社会规范被逐步打破,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络出现了碎片化趋向,当前的乡村社会已经很难符合人们脑海中有熟人社会的传统想象了。这既意味着乡

村社会亟待重建和再造,也意味着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土壤,并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显然已经进入新的时期。本书意图讨论的,便是乡村治理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和走向问题。最终,作者将“有为而治”作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指向。“有为而治”内含“节俭”和“高效”两个特征:“节俭”意味着乡村治理体系的运转需要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之上。一些在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比如自治和德治,必须坚持下来;而现代化的治理方式,比如法治,也应该结合乡村实际,与自治、德治相结合,让法治成为社会的内生秩序;“高效”则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满足于形式上的现代化,而是要能有效回应乡村社会的需求。当前的乡村社会正处于巨变过程中,社会秩序在重构,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改变,利益群体在分化,唯有及时、有效地回应乡村巨变的现实,才谈得上